

你也许不同意摩罗的观点，但你无法回避本书所提出的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被撕裂的痛苦命运是如何形成的？除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外，是否还交织着自我撕裂的主动选择？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一系列失败以后，在一个多世纪的富国强民的艰苦追求中，是否引发并促进了国人全面的精神崩溃？中华文明是否发生了彻底的断裂？它又是如何被撕裂的？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在出现现代化的全面皈依中，文化精英们是否产生了自我理想的文化心理？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被释放出来的？其中又交织着什么样的权力博弈？今天的中国人面临着何种处境？未来中国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如何行动？若要了解这一切，你不能不读这本书！若想解答这一切，你不能不独立思考！

中国的疼痛

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

CHINA'S ACHE

摩罗◎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中国的疼痛

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

CHINA'S ACHE

摩罗◎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摩罗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重新发现中国文丛)

ISBN 978-7-309-07525-0

I. 中… II. 摩… III. 民族性-研究-中国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2865 号

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

摩 罗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01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100

ISBN 978-7-309-07525-0/C·157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新发现中国文丛”学术委员会

主编：邓正来

主编助理：孙国东 林 曦

主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王国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员)

刘清平(复旦大学哲学教授)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人类学教授)

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人类学教授)

张乐天(复旦大学人类学教授)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胡必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韦 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员)

林尚立(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任 远(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

陈明明(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

顾 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政治学教授)

郭苏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政治学教授)

邓正来(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

根据中国 走向世界

——“重新发现中国文丛”序

邓正来*

晚近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诸如“西方的终结”、“中国拯救资本主义”、“中国统治世界”这样的话语充斥着中国社会科学界。在这种学术风尚盛行之前,我主要经由三个方面的学术努力从理论上论证中国社会科学实现“知识转型”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第一,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全球化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也是一个话语的问题,是何种视角将支配我们审视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我经由细致研究后认为,我们在被卷入一种所谓客观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介入了一场有关全球化的“话语争斗”之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其核心就是话语争夺权的问题。而这场话语争斗的关键意义便在于它向我们开放出了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即我们究竟面对的是谁的全球化?何种“全球化”?这不仅要求我们强调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意识”,更是要求我们强调一种由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构成的全球化进程。这种要求所依凭的乃是乌尔利希·贝克在全球化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这样一种颇为著名的概念分析框架:广义的全球化既不只是一种客观现实,也不只是一种主观建构,而更是一种主客观的互动进程,而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便是被分别称为全球性、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三

*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



个概念^①。显然,这一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它给我们开放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维度,亦即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全球化的话语争斗维度。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对那种片面强调全球性或全球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种因素繁复互动的问题的时候总是很随意或者很习惯地把它们描述成一个极其片面的平面图像?因此,将全球化问题本身做“问题化”处理的努力,不仅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全球性和全球主义是一起出场的,而且还意味着我们绝不当简单地以为全球化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客观现象,而应当充分意识到全球主义对全球性的建构或形塑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当介入到有关全球化之性质的“话语争斗”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而其核心问题便是有关何谓“全球化”或“全球化”何去何从的话语争夺权的问题。质言之,全球化就其性质而言其实是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②。

第二,当下中国所进入的“世界结构”对中国构成了基于“承诺”的支配,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其实为中国和中国社会科学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我看来,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加入世界结构之后,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却是被纳入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换言之,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是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守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与之进行“共谋”。这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为中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事实上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即给我们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但我们能否将这种资格转化为现实的修改规则的能力,其前提乃在于:作为“思想库”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关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理想图景”;否则,我们所获得的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如果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方面的理想图景,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只能要么拥抱西

① 参见 U.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2000, 转引自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载《欧洲》2000年第1期。

② 参见邓正来:《谁之全球化? 何种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四章。

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①。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进入了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第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知识实是一种以权力和“正当性赋予”为基本实质的话语。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②。此前,正是因我们对潜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中国社会科学所形成的全球化话语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秩序在根本上乃是以“西方理想图景”为依归的。因此,只要我们洞见到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这种“正当性赋予”力量并恢复其批判性品格,我们同样能够以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为灵感之源、以基于中国视角对“世界理想图景”的想象为理论依据而建构我们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而推动这种理论走向世界。

正是主要以上述理论洞见为基础,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我所谓的“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同时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我们究竟拿什么样的成果走向世界呢?我个人一直坚持这样的一种观点:毛泽东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不仅可以适用于中国文学艺术事业,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科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

① 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23页。

② 同上书,第266—267页。



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个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西方化”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二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国文化为支撑的,因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然是“地方性”的。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用一种“地方性”的社会科学来解释和回答中国和世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据此,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一是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让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以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秩序重构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三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的烙印,也是我们可以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的地方,更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重新发现的重中之重。

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重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要主张我们要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发掘中国和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和思想资源;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的文明体;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创办了这套“重新发现中国文丛”。我们期望:它既成为中国学术丛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亦能成为新时期最著名的“中国研究”大型文丛;既能成为我们将世界著名中国研究成果“引进来”的一个学术渠道,亦能成为推动以中国深度研究为特色的学术成果“走出去”的一个学术平台!

题 词

於兮，美哉我国！於兮，伟大哉我国民！吾当草此论之始，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吾欲草此论，吾之热血，如火如荼，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气焰之何以喷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兮！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自序

本书一度打算题名为“国民性批判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危机”。后来由于写作计划有所变更,这个书名就显得不合适。于是更名为“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

国民性批判,本来就是文化领域的问题,而当代中国在应对全球化运动时遭遇的许多困境,其根源至少一部分就隐藏于五四以来错误的文化认识、文化选择之中。我原打算讨论而又未及展开考究的政治认同危机问题,一方面固然缘于现实中的利益博弈;另一方面,恐怕也与五四以来日益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有关。所以,现在的书名更为合适。

一直到接近书稿交差的最后日子,我忽然决定,将原书名降级为副标题,正题改为“中国的疼痛”。我对这个书名很满意。它准确表达了我最近几年阅读活动中的心理感受,同时似乎也准确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蹂躏、被撕裂的痛苦命运。

我在阅读美洲印第安人、南太平洋毛利人、非洲人、印度人、中国人面对欧洲人的殖民掠夺与屠杀节节失败的悲惨历史时,那种疼痛感几年之后依然滞留在脑神经中。对于中国的失败和乱局我当然会关注得更多。从魏源林则徐,到康有为梁启超,到鲁迅陈独秀,他们伴着民族失败和文化衰亡所体会到的绝望和痛感,深深感染了我。他们中不少人不只是用精神,而且真正用自己的身体承受着这样的灭亡之痛,梁济、王国维的自杀即是极为突出的例子。梁启超大病初愈时,散步中听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政治新闻,回到家中复又卧床不起。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两天两夜无法吃饭睡觉。

《中国的疼痛》并没有充分展现上述精英人物的有关内容,因为我更多地关注的是民族机体的整体命运。我试图在两组关系中,探讨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当然,我只展示这种权力博弈在文化领域的表现。

第一组关系是欧洲殖民者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权力博弈；第二组是中华民族内部上流社会精英群体与下流社会草根群体之间的文化权力博弈。这两组群体的权力博弈存在着互动关系，而文化权力的博弈又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博弈相纠缠，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牵扯。殖民者的出现，可能加强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却严重破坏了我们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认同，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重新分化、组合中，不同的群体在文化上也难免产生抵触甚至对立。近代中国之所以如此动荡，之所以有如此多元甚至对立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选择，如此自觉的“阶级斗争”，跟欧洲殖民势力的文化侵略和文化霸权密切相关。

总之，在欧洲人所进行的殖民侵略和全球化(殖民的另一种方式)掠夺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与文化经受着惨绝人寰的撕裂之痛。这种持续两百年的疼痛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深刻的认同危机。本书仅从文化博弈的角度，对这种全方位的权力博弈和认同危机，作了一些粗浅的描述。

文化认同和利益认同的危机，迟早会以政治认同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包括文化权力在内的一切权力的博弈，最终都要体现为政治权力的博弈。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中，真正的隐患也许就在这里。最近多次听一位前辈学者说，这是一个大分化的时代，就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样的大分化时代。这位前辈学者的现实感受，似乎比我所说的“隐患”要强烈得多。

两百年来被撕裂的疼痛，消耗着民族的膏血，也积聚着某种精神能量。这种能量有可能导致新生，然而也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撕裂。一位患脑肿瘤的朋友曾经跟我说，在开刀以前，他以为切除肿瘤是最大的疼痛；切除之后，他以为化疗才是最大的疼痛；化疗失败之后他才知道，最后的崩溃才是最大的疼痛。

好在民族肌体与个人不尽相同。人只有一死，民族却可能在“九死”之后获得“一生”。柳暗花明的希望总是有的，这才是我们言说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所有言说的期盼和旨归所在。

在研究过五百年殖民史之后，在对全世界的多种文明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比较研究之后，我深深地确信，中国人民是地球上最善良、最敦厚、最伟大的人民。殖民势力和五四前贤关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描述和批评，纯属无稽之谈。中华民族背负这样的诬陷和自虐崛起于世，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善良、敦厚和无可比拟的文化力量。去年秋天我为生我养我的村庄写过一篇散文，结尾云：“走遍天涯我只想与你

相依为命,三千大千世界你是我唯一的家。”此刻我想将此言送给我的族和我的国。

在最近几年的阅读范围中,近代人物与我心理最为贴近的是梁启超。他对于这个伟大民族深入骨髓的深挚感情,堪称感天动地。他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热情,他寻找民族复兴之道、指引民族前进方向的坚定信念,都是这个民族内在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表现。我选择梁启超的一段话作为本书题词,实在含有深意和深愿。兹将此话作为本序言的结尾,再一次与读者朋友分享:

“於兮,美哉我国!於兮,伟大哉我国民!吾当草此论之始,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吾欲草此论,吾之热血,如火如荼,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气焰之何以喷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兮!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

2010年3月30日 北京北小河边

解题 什么是文化政治学

每一个政治实体创造文化,都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置于文化的中心位置,而且都企图用这种文化将其他政治实体组织到自己的政治框架和利益框架中来。传播文化的过程,就是建立权威和谋求利益的过程。这种现象就是文化政治现象。对这种现象进行关注、描述和研究,就是文化政治学。

某个政治实体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普世化,而刻意强调自己的文化是普世文化、自己的价值是普世价值,这恰是文化政治学的一点小奥秘。只有像中国五四时贤这样的精神崩溃的群体,才如此缺乏判断力,竟然看不透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奥秘。

以蔡元培、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精英群体主动放弃中国文化,接受并崇拜西方文化,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民性格等进行卑贱化描述和批判,实际上就是成全了西方的霸权和利益——虽然他们的主观意图未必如此。

清末民初那一代文化领袖,他们与西方社会、西方国家有文化和价值认同上的联系;可是在血缘上和社会组织上,他们又只能属于中国社会。这种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矛盾,将给他们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孤独者》的主人公,就是这种精神分裂的典型病例。中国传统社会的家长聘请他们给孩子教授子曰诗云等传统文化,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奇耻大辱;他们在长辈逝世之后,虽然不得不参加富于中国特色的葬礼,但却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加给他们的最大折磨,并因此而怀有深刻的仇恨。作为西方文化承载者的魏连殳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寒石山村民在祖母葬礼上那种剑拔弩张、决一死战的态度,恰好表现了新一代精英人物精神分裂的程度及其疼痛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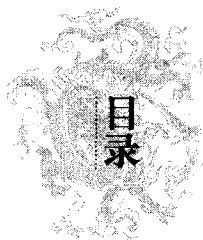
鲁迅对于这场葬礼上的较量投入如此大的兴趣与热情,可见他对于魏连殳式的精神分裂的体会有多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一代精英人物,迅速成为引导中国文化前途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所选择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的正统和主流。此后几代国人,都是在这种主流文化和主流教育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寒石山村民所坚守的文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和扫荡,他们所承受的文化崩溃的疼痛,并不比精英人物少一些。

一部分精英人物率先体验到的精神分裂,外化为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分裂和社会分裂,中国社会因此而遭遇着广泛的撕裂与疼痛。

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就是这种疼痛的升级版。



题词

自序

解题 什么是文化政治学

绪 论 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 /001

第一章 国民性批判与“卖矛诱导”体系 /003

国民性批判中的双重权力关系 /003

楚人卖矛者与“卖矛诱导”体系 /006

“卖矛诱导”体系与小圈子利益 /008

人文文化体系与文化政治学 /012

第二章 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 /017

小圈子与大圈子的变迁 /017

文化力量与制度力量相互为用 /021

人文学术体系与国民性批判 /024

人文学术体系和法律体系相互为用 /028

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 /030

第三章 国民性批判与经济政治学 /033

人文学术体系与知识分子的利益选择 /033

国民性批判与精英意识形态体系 /036

文化政治学与经济政治学相互为用 /040

文化政治学的利益指向举例 /042



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殖民主义陷阱 /047

- 第一章 中国“国民劣根性”学说的殖民主义起源 /049
 - 西方商人、政客判定中国人“软弱、鄙贱、无耻” /049
 - 西方学者判定中国人“欺骗、愚昧、奴性、邪恶” /055
 - 中国精英认可并坚守殖民话语的背景 /059
- 第二章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与改造 /062
 -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与批评 /062
 - 西方传教士用基督教改造中国国民性 /066
- 第三章 西方传教士与殖民势力完全一体化 /074
 - 传教士热衷于军事占领和屠杀 /074
 - 传教士热衷于掠夺中国财富 /078
 - 传教士的教化与殖民者的枪炮相互支持 /083
 - 李提摩太和丁韪良：殖民主义战略家 /086

第二编 国民性批判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093

- 第一章 国民性批判与近代思想史上制度变革的主线 /095
 - 国民性批判：思想文化视角 /095
 - 国民性批判的帝国主义压力 /097
 - 国民性批判的政治制度指向 /103
- 第二章 五四精英群体的文化选择 /109
 - 文化启蒙：五四精英群体的路径选择 /109
 - 尖锐对立：五四以前褒贬中的文化批评 /112
 - 全盘西化：五四精英群体的文化选择 /116
- 第三章 五四精英群体的教育改造及其历史影响 /123
 -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与建议 /124
 - 京师同文馆及教会学校中西并重的课程设置 /129
 - 中西并重的“张之洞学制”和全盘西化的“蔡元培学制” /136

第三编 《中国人气质》对国民性批判的影响 /145

- 第一章 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个想象的功利的文本 /147

	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个想象的文本 /147
	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个功利的文本 /151
第二章	鲁迅与涩江保日译本《支那人气质》 /155
	涩江保日译本《支那人气质》 /155
	鲁迅与涩江保日译本《支那人气质》的关系 /157
第三章	鲁迅对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推崇 /160
	《支那人气质》一书在鲁迅心中的分量 /160
	许寿裳谈鲁迅与国民性问题 /163
第四章	鲁迅作品究竟受到《中国人气质》哪些影响 /165
	《中国人气质》对鲁迅作品的影响(唐弢的研究) /165
	《中国人气质》对鲁迅作品的影响(张梦阳的研究) /167
第五章	“第一代”中国学人与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关系 /173
	茅盾与《中国人气质》 /174
	马君武与《中国人气质》 /176
	潘光旦与《中国人气质》 /178
	李景汉与《中国人气质》 /179
	“作新社”与《中国人气质》 /184
第六章	“第二代”中国学人与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关系 /185
	为鲁迅与《中国人气质》的关系辩护 /186
	借《中国人气质》重启启蒙话语 /189
第七章	“第三代”中国学人对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批评 /194
	刘禾的批评 /195
	冯骥才的批评 /199
	周宁的批评 /200
	中国学界对刘禾、冯骥才、周宁的反批评 /203
	附录一 阿金 /207
	附录二 柔顺的固执 /210

第四编 国民性批判与底层群体的命运 /213

第一章	两面作战的鲁迅：反抗精英与批判底层 /215
	在精英人士眼中，大众始终是“愚昧”的 /215